

楚式镇墓兽研究

黄莹

(湖北省楚文化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Chu's tomb guardians. According to the obvious archaeology excavation materials, the author inspects special details of 335 tomb guardia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ime differenc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the rank difference, the author has carried on the research, and presents the preliminary reasons to these kinds of chang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antler; head and body; pedestal.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omb guardians are buried as funerary objects, and are used to exorcise evil spirits and protect the grave. They are Chu people's worships gods which drive the snakes and exorcises evil spirits.

Key words: tomb guardians, antler, head and body, pedestal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楚式镇墓兽的研究情况。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发掘资料, 作者考察了 335 座镇墓兽的具体情况, 并从时间差异、地区差异、等级差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初步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文章分析了鹿角、头身、底座三个基本部分的内涵和意义, 认为随葬镇墓兽是用来镇墓辟邪, 它就是楚人崇拜的驱蛇辟邪的镇墓之神。

关键词: 镇墓兽; 鹿角; 头身; 底座

楚式镇墓兽, 是先秦楚墓中较为常见的随葬品, 在其他的国族墓中基本不见, 因而成为楚墓中的典型器物。由于其带鹿角的怪兽形状神秘恐怖,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好奇和探究, 反映出楚人一种鲜明而独特的信仰观。之所以称之为楚式镇墓兽, 是与战国以后的两汉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时期的随葬明器镇墓兽相区别。后世的镇墓兽, 有的是石雕的, 有的是铜制的, 有的是陶制的, 都不同于木制的楚式“镇墓兽”^①, 所以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双翼怪兽, 被称作“镇墓神兽”^②, 但却是铜制的, 与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也大为不同。本文所论的是楚墓所出的木制镇墓兽(以下称镇墓兽)。

一、研究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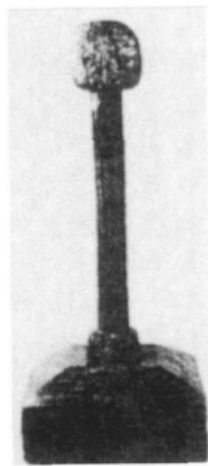
镇墓兽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 1937 年湖南长沙的一批楚墓遭到盗掘, 所得的镇墓兽一部分流往海外, 一部分散失。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最早著文介绍, 称作“山神像”, 或者称作“镇墓兽”, 作用为镇妖辟邪^③。因为概括了这种

可怖怪兽的基本特征, 其名一直被沿用至今。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把它称作“木雕怪兽像”^④。商承祚先生在记述长沙盗墓者所得的文物时曾经提到“镇墓兽”, 称作“楚漆龙坐”、“楚漆蛇”和“木鬼方座”^⑤。李学勤先生说到镇墓兽时指出, 这种漆木“镇墓兽”, “是楚墓特有的, 充分表现了楚国漆器艺术的传统风格”^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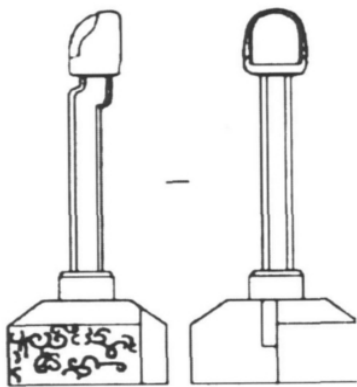
镇墓兽的真正意义, 学者们做了很多探究。最早是王瑞明的山神说^⑦; 陈跃均、院文清的土伯说^⑧; 彭浩的龙说^⑨; 吴荣曾的操蛇神说^⑩; 蒋卫东的为生者而设的镇凶辟邪神说^⑪; 顾丞峰的“黑人”说^⑫; 潘佳红的灵兽说^⑬; 张君的十一种假设^⑭; 邱东联的巫觋神说^⑮; 松崎权子的巫祝说^⑯; 陈振裕的引魂升天说^⑰; 郑曙斌的安魄说^⑱; 吉村芭子的夔龙说^⑲; 王子今的保护墓主说^⑳; 邹英都的镇墓辟邪和引魂升天说^㉑; 王琳的辟除不详说^㉒; 杨怡的引魂升仙说^㉓; 袁朝、李儒胜的“坟羊”说^㉔; 丁兰的“载魂升天的法器”说^㉕; 高崇文的“祖重”说^㉖。除了以上专论镇墓兽的文章外, 也有很多学者在文章或专著

中论及,也在此一并列出:安志敏、陈公柔认为镇墓兽的作用与长沙子弹库帛书相同,都是用来镇墓辟邪²⁷;孙作云在考察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漆棺画时,认为土伯与楚墓中的镇墓兽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是同一物²⁸;文崇一认为镇墓兽含有巫术的作用,用来压邪,保护死者灵魂²⁹;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一书中,肯定了陈跃均、院文清的观点,认为镇墓兽即土伯,可以改称为“木雕土伯像”³⁰,其在《楚文化志》一书中,提出“镇墓兽是一种变形的龙”³¹,是希望死者的灵魂得以飞升上天;杨景鹤在《方相氏与大傩》一文中,认为镇墓兽的功能和设置与方相是一样的,不仅能为活人驱灾逐疫,还能为死者除邪³²;吴荣曾则认为是一种神灵的代表,对坟墓或死者具有某种佑护的作用³³;李玉洁认为镇墓兽是保护死者的神异之兽³⁴;皮道坚则分析了各种有关镇墓兽功能的说法,认为其形象应该是引魂升天的龙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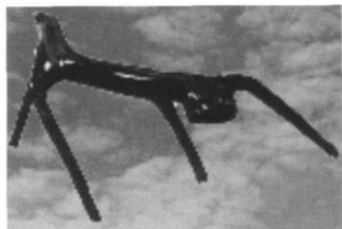
以上诸位学者对镇墓兽的论述,多集中于对其形象和功能的讨论。分析各家的论点,都公认镇墓兽与楚人的巫术有关。就形象而言,早期主要是山神、土伯、龙等三种说法较为流行,后期出现了操蛇神、镇凶辟邪神、引魂升天兽、坟羊、巫觋神、祖重等说法;功能方面比较一致,主要有镇墓辟邪、引魂升天两种观点。早期多镇墓说,后期多升天说。但究竟镇墓兽形象是什么?有什么功能?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总结了相关考古资料,统计得出目前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镇墓兽共有335件,试从时间、地区、等级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镇墓兽形制变化的因素:



图一 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早期祖形)



图二 当阳曹家岗5号墓出土(早期祖型)



图三 马山1号墓出土的木辟邪(早期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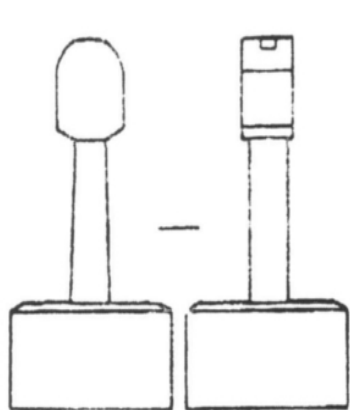
二、时间差异

镇墓兽出现的时间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期间形制变化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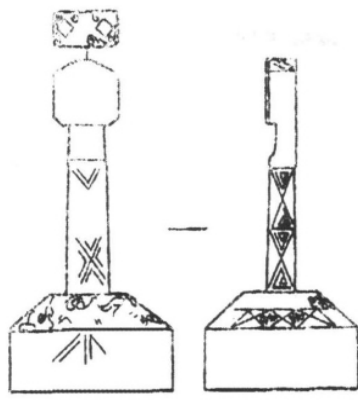
(一) 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镇墓兽以祖型为主,面目简单模糊。最早的镇墓兽是春秋中晚期的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图一),“头作圆角方型。中立四棱柱形身躯,下接覆斗状方座”³⁶,被称作“祖型”。这件木制的镇墓兽,头部没有插鹿角的榫头,也没有发现鹿角,只有底座和头身两部分。到了春秋晚期的当阳曹家岗5号墓(图二),出土的镇墓兽头顶也没有榫头,同样也没有插上鹿角,但首次出现了曲颈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陪棺中出土了四只鹿角的残片³⁷。同是春秋晚期的襄阳山湾墓地,在7座墓中发现了鹿角³⁸,这是楚墓中最早出现的单独用鹿角陪葬的实例。战国中期的江陵马山1号墓³⁹,还出土了一件虎首龙身四足木辟邪(图三),作行走状,也被看作是镇墓兽的祖型,有四足,雕有蛇、蛙等物。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荆州枣林岗与堆金台楚墓⁴⁰,出土了20件镇墓兽,其中16件器形完整,分为A、B、C三型。A型“方座,台面平。直身,无颈。圆顶方首,体形厚实。脸面无器官。头顶有对称的小方孔。”(图四)这是楚式镇墓兽在头顶首次出现了对称的小方孔,应该是插鹿角用的。此后出土的楚式镇墓兽大都头顶有孔,用来插鹿角,鹿角成为典型的形制特征。B型“直身,曲颈。斜边方脸,两侧有菱形孔”。(图五)C型已是“直身,曲颈,身中部起凸棱,首面目浮雕有眼、獠牙及长舌等”。(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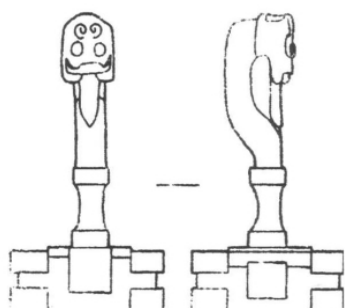
这三种类型清楚地展示了从春秋晚期的直身无颈、圆顶方首、脸面无器官,到战国早期的直身曲颈、圆眼凸额、獠牙、口吐长舌、兽面狰狞。另外镇墓兽身体的中部开始出现了凸棱,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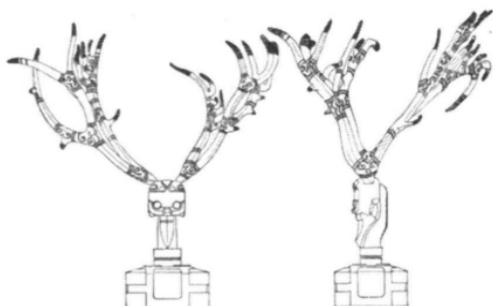
图四 枣林岗与堆金台 A 型
(JZM146 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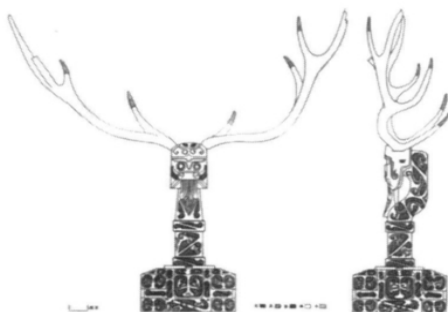
图五 枣林岗与堆金台 B 型
(JZM121 号墓)



图六 枣林岗与堆金台 C 型
(JZM99 号墓)



图七 雨台山 M354 出土



图八 九店 M295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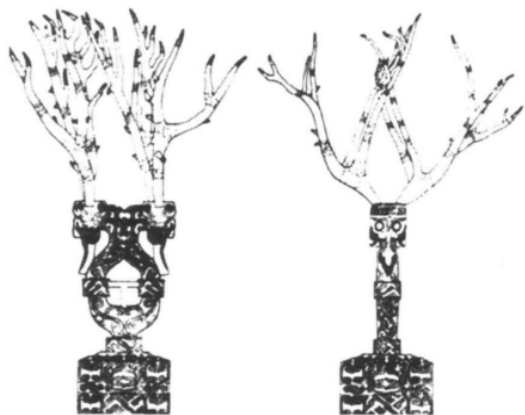
束腰一般。在近底座处起棱，底座也出现了凸凹相间的九个方块。这种战国早期出现的单头兽面镇墓兽，头顶鹿角，兽面狰狞，底座凸凹，成为此后出土数量最多的典型形象。

(二) 战国中期，镇墓兽出现了繁荣的鼎盛局面，达到巅峰。在继承战国早期形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单头兽面和双头兽面。战国中期的楚墓大都随葬有镇墓兽，如江陵雨台山、江陵九店、当阳赵家湖的家族墓地；溪峨山、纪城、太晖观楚墓群；还有大型的单座楚墓，如天星观 1 号墓、包山 1 号墓、望山 1 号、2 号墓、沙冢 1 号墓、马山 2 号墓等。这些高大精美、纹饰繁缛的镇墓兽，一改最初的简单造型，呈现出成熟的形制和威严的气势。

雨台山 M354 “兽面雕刻，凸眼，龇牙，长舌，曲颈，长方形身躯。通身涂墨。”^⑪（图七）九店 M295 “器表图案色彩丰富，有褐、黄、黑、白四色”^⑫。（图八）望山 M1：“怪兽的头、身相背向，兽面雕刻，眼外凸，卷眉，龇牙，长舌，曲颈与兽身下部相连，同插于方座

上。”^⑬（图九）荆州天星观 M2 “二怪兽头对称背向相连。两兽面为雕刻而成，眼外突，卷眉，圆鼻孔，龇牙咧嘴，长舌下垂。两兽头曲颈相连，分体挺胸，方柱形的细长身，腹部各有一方形腰带，下肢又连成方形体，并用一方形腰带捆束，底端成榫头插入方座之上。方座上部雕成斜面，呈梯形。”^⑭（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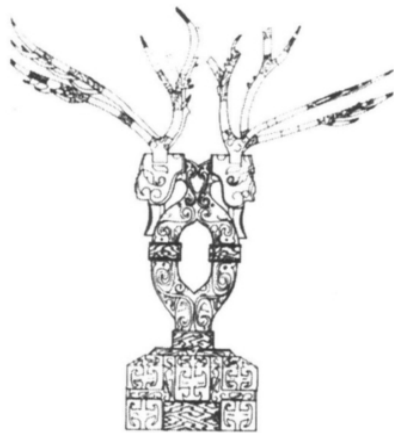
战国中期的楚式镇墓兽大多很高大，不仅有复杂的单头兽面式（图十一），又出现了双头兽面的形制。（图十二）这种双头兽面联体型镇墓兽的原型，应为双头蛇，它的出现可能与楚人对双头蛇的恐惧有关。贾谊《新书·春秋》中记载“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已埋之也。’”这里透露出楚人有见双头蛇死的习俗，双蛇交尾的造型象征死亡，蕴含着强大的神秘力量。显然双头兽面形制比单头兽面威力更大，作用更强，因此多出现在级别较高的楚墓中，如望



图九 望山 M1 出土

山 1 号墓，天星观 1 号、2 号墓。除了双头兽面引人注目外，底座也稍有变化。包山 1 号墓所出镇墓兽就是“座面内侧凿四个方形外凸饰，座面外侧及座上外侧凿八个方形外凸饰，座底四角为四个方形外凸饰”^⑤。此时鹿角成为普遍特征，双头形制的镇墓兽还出现了四支鹿角；兽面都是“凸眼，龇牙，长舌，曲颈”，出现很多吐舌的形象；多在腰部起棱，有了束腰；春秋晚期的底座为“覆斗状”^⑥，战国中期的方座多呈梯形，雕成斜面，多有凸饰，显出了凸凹面。

这时的镇墓兽高大精美，雕刻的方法和技艺越发成熟，色彩艳丽，纹饰繁复。有的镇墓兽用腰带捆束在身躯上，出现了腰身，正应和了“楚人好细腰”的习俗，与同为典型楚器的束腰“升鼎”相映成趣。它们大多通体髹黑漆，然后用红、黄等颜色彩绘，其身上多饰卷云纹和龙纹。这一时期也是楚国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广阔，文学艺术繁荣，在丧葬文化中也得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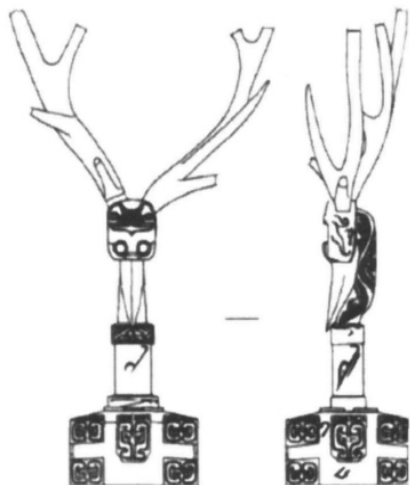


图十 荆州天星观 M2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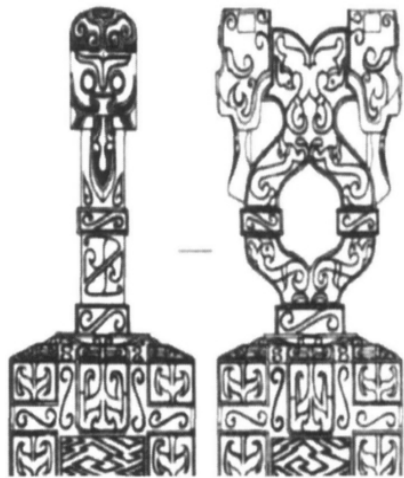
相应地体现。

(三) 战国晚期，镇墓兽的数量急剧减少，不再出现双头兽面的形制，且面目重新回复简单。但头面出现了人面变化，拟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楚国灭亡后，楚式镇墓兽也随之消亡，从此不见。战国晚期的镇墓兽仍有鹿角，但兽面已有明显变化。如雨台山战国晚期的 555 号墓出土的一件，“面近似人形，眼鼻雕刻，垂长舌，直颈”^⑦。(图十三) 九店 712 号墓的一件，“面部方形，长舌，身细高。头插鹿角，身下部近座处起台”^⑧。(图十四) 这时不大见恐怖的兽面形象，面部多方形，五官也从彩绘发展为雕刻，有了人面的形象；兽身也少见“束腰”的腰身，可见只有战国中期才有“束腰”的形象；底座也稍有不同，在近座处起台，不见凸凹的方块，但仍然是梯形斜面的方座。

从战国早期到晚期，镇墓兽仍由三部分组成：鹿角、头身、底座。变化的是直身变屈身、



图十一 单头兽面（江陵九店 51 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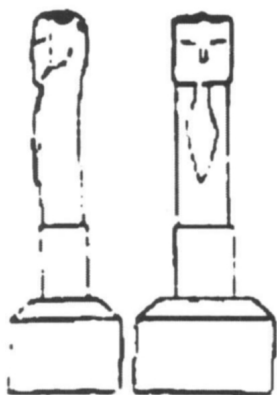


图十二 双头兽面（江陵九店 546 号墓）

单头变双头、圆脸变方脸、兽面变人面、无舌变长舌、无颈变曲颈或长颈、狰狞变和善、兽面由彩绘变雕刻，束腰和底座的凸凹方块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等。显然，战国中期是镇墓兽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种变化无非都是渲染怪诞恐怖的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转变，到战国末期，镇墓兽形状变得简单、拟人化趋势明显，直至逐渐消失。

三、地区差异

镇墓兽主要在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出土。湖北主要在江陵（荆州）、当阳、枝江、襄阳、鄂城、黄冈等地，都在楚国都城附近；湖南主要在长沙、临澧、湘乡、益阳等地；河南主要在信阳。其中湖北最多，约91%，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楚国腹地江陵尤为突出，占有总数的84.7%，几乎常见镇墓兽的出土，反映出统治中心上层贵族对这种丧葬用器的笃信。看来随葬镇墓兽是楚人的精神信仰，渐渐向外波及，而且越是中心，其信仰越是根深蒂固。江陵雨台山和九店出土的镇墓兽数量最多，楚郢都附近的江陵天星观1号墓中出土了最大最复杂的一座镇墓兽，这些均是此一论断的佐证。而且湖南、河南等地出土的镇墓兽都是在战国中期，是这一信仰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当时楚国影响力最为强大的时期，可见，国势昌盛的楚国把随葬镇墓兽的丧葬习俗传播到南楚地



图十三 雨台山 555 号墓出土区。



图十四 江陵九店 712 号墓出土

湖南出土的镇墓兽多为黑漆彩绘，形制基本相同，也有自己的特点。1971 年湖南长沙浏城桥 1 号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的单头兽面镇墓兽，“兽身作方形，兽首，两眼圆睁，口吐尖舌，狰狞可怕，颈部弯曲，身绘云纹”^⑨。（图十五）这件镇墓兽与江陵地区所出的极为相似，应为楚国贵族分封到长沙时，对故地丧葬信仰的继承。但在偏离故都的南楚，还是有些变化。1980 年湖南常德临澧九里 1 号墓出土了一件黑漆镇墓兽，“兽身方形，头作虎首状，竖耳，曲颈，口吐长舌，舌连到胸部，面目狰狞；身躯作龙形”^⑩。（图十六）临澧九里 1 号墓规模与江陵天星观 1 号墓等大，可能是楚国一个封君的家庭墓地。在这座有着 11 级台阶的封君级大墓中，同样的镇

墓兽共出有 6 件，这也是单个墓中出土镇墓兽数量最多的特例，南楚地区战国中期典型的、也是所见最大的镇墓兽亦出于此墓中。从形制上看，兽首变为明显的虎形，出现了虎耳，而且上竖，吐舌更长，龙颈上增加有鱼鳞状纹饰，底座也是简单的方形，没有江陵常见的凸凹方块。此外，湖南湘乡牛形山 1 号楚墓出土的一件镇墓兽作噬蛇状，有双首，一首为蛇形，另一首镇墓兽头作噬蛇状，而蛇似乎已经被压得不能动弹^⑪。在远离楚国统治中心的南楚地区，贵族们有更多的自由意志，不仅大胆地僭越礼制，而且受百越文化的影响，让镇墓兽显示出了虎型和驱蛇的形象。



图十五 湖南临澧九里 1 号楚墓出土



图十六 湖南长沙浏城桥 1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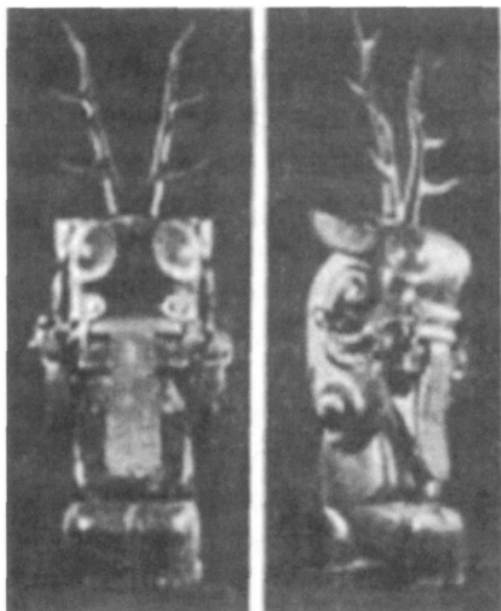
河南地区的镇墓兽出土较少，只有 2

件，与湖北相比，相同之处为都有鹿角、兽面、圆目、长舌、彩绘；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底座，呈蹲坐状，前肢上举，两爪持蛇，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竖耳双乳。信阳长台关1号墓所出镇墓兽“作蹲坐状。前肢上举，两爪持蛇，作吞食状。在前肢的肘部各凿有长方孔”^②。（图十七）2号墓的一件则“头插鹿角，双角直竖，两目圆大，上唇外卷，露齿，舌伸垂及胸部”^③。另外同出的3件彩绘双鹿角器（图十八）与湖北楚国腹地出土的镇墓兽形象很相似，稍微不同的是没有兽面，没有弯曲的颈部，底座为方形而不是梯形。河南信阳与湖北临近，距离江陵也不远。事实上，若是从形制上看，这3件双鹿角器更接近江陵的镇墓兽，有鹿角、头身、束腰、底座，符合江陵地区战国中期的典型特征。而1、2号墓出土的没有底座的这2件抓蛇镇墓兽，一些学者认为是《山海经》中的操蛇怪“强梁”^④或“黑人”^⑤的形象，都是吃蛇驱鬼的神兽。这些操蛇驱蛇的形象在江陵楚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只在湖南或河南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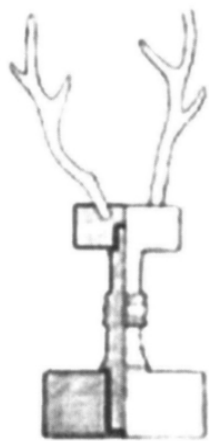
湖南、河南的镇墓兽出土数量不多，远远少于湖北的江陵等地，且出现了虎首、竖耳、抓蛇的形制变化。在远离楚国都城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操蛇驱蛇形象，暗示着镇墓兽的真正作用和意义。

四、等级差异

从随葬镇墓兽的墓地情况看，墓主人的身份



图十七 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



图十八 信阳长台关
2号墓出土的
双鹿角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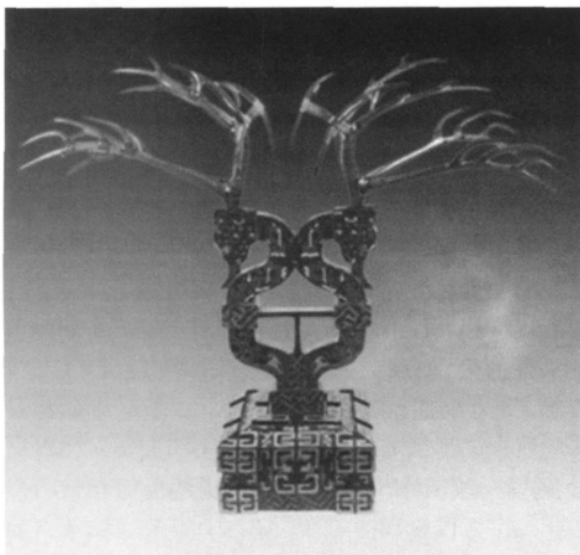
从上卿（封君）至士，葬具也从二椁三棺到一椁一棺，可见，它主要随葬在一些有身份的人的墓中，有其他或多或少的随葬品。从葬具来看，镇墓兽多出自有一椁一棺的士级，或士以上的大夫级墓地中，而且等级越高，镇墓兽的形制越复杂，高度越高。双头镇墓兽都出土在大型的楚墓中，少见平民墓地中便是例证。这是因为中国的等级社会历来是金字塔式结构，越往上层，数量越少，我们所见的上层贵族墓数量远远少于平民墓地，所以双头镇墓兽的数量也远远少于单头。在江陵九店东周墓地中，楚墓有578座，其中“元士”级的甲类墓有22座，是九店东周墓地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其中7座墓出土有镇墓兽，占31.8%；“下士”级的乙类墓有299座，有58座墓出土镇墓兽，占19.4%^⑥；显然甲类墓随葬镇墓兽的比例要高，其中3件双头镇墓兽中的2件，就出自甲类墓。这说明这种信仰多在中上级贵族官僚中盛行，而且等级越高，信奉得越虔诚，由单头变成了双头。同样，在当阳赵家湖出土的10件镇墓兽中，2件出自甲类墓，占总数（18座）的11.1%；8件出自乙类墓，占总数（129座）的6.2%^⑦。虽然不是每座甲类墓都随葬镇墓兽，但墓主等级越高，比例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在出土镇墓兽的所有墓地中，以天星观1号墓和临澧九里1号墓规格最高，属楚国的封君，葬制用的是“上卿”之礼。天星观1号墓的镇墓兽异常精美（图十九），采用红、黄、金三色彩绘，通体遍布各种纹饰。临澧九里1号墓中的一件镇墓兽是在龙身上漆绘黄色鱼鳞状纹和变形云纹。而平民墓地如江陵雨台山墓地中，有的形制简单，仅仅是通身涂墨。（图二十）当然这正符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葬礼制，等级不同，所享用的丧葬仪礼是完全不同的。

楚式镇墓兽高度大约在6.6cm~170cm，早期出现的高度较矮，中期鼎盛时期出现的高度较高，晚期又较矮，表明了这种信仰随时间逐渐产

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此外，等级越高的楚墓，形制越复杂，越高大清晰。如天星观1号墓，为封君墓，所出镇墓兽双头兽面，高达170cm。其次是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所出蹲坐状的噬蛇镇墓兽，高152cm。最矮的镇墓兽出现在湖南临澧，高度为6.6cm~35cm。湖南出土的镇墓兽大多比江陵所出的矮小。与天星观1号同等级的临澧九里1号墓的一件镇墓兽高97cm。有着二椁三棺葬具的湖南湘乡牛形山2号墓出土的一件高57cm。而在江陵，随意一座一棺一椁墓随葬的镇墓兽就高达105.6cm（雨台山M264）。在远离楚都的地区，中上层贵族官僚受到楚文化中心的影响越小，按照礼制规范的束缚也越小，甚至出现了僭越的情况。湖北楚墓中，绝大多数都是每座墓随葬1件镇墓兽，即使是封君级别的天星观1号、2号墓也是如此。只有望山2号墓出土过2件^③，鄂城百子畈5号墓出土过2件^④，而在湖南临澧九里1号墓却绝无仅有地出土了6件。这种对礼制的僭越情况，在楚国腹地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情况说明，随着楚国当时的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文化信仰等从中心向外辐射，随葬镇墓兽的丧葬礼制也随之向外辐射。而且，距楚文化腹地越近，镇墓兽的礼仪形制越规范；而距离越远，镇墓兽的礼仪形制越随意。

五、形制分析

根据以上镇墓兽的演变过程，我们再来对其形制进行分析：



图十九 天星观1号墓出土



图二十 藤店1号墓出土

（一）鹿角

最早的祖型镇墓兽，是没有鹿角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原来的头顶上加上了鹿角，并逐渐融为一体。显然插上鹿角后，两者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一和加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鹿角，据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专家曹克清鉴定，“显然属于麋鹿角枝。它们代表着战国中晚期楚地这种动物的首次发现”^⑤。麋鹿角因为眉杈发达，更是很早就被看成是防御敌人的有力武器。《史记》有“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⑥记述的就是使用麋鹿角驱赶敌人。《后汉书》记载“蔡邕《独断》曰‘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气始起，麋鹿角解，故寝兵鼓。’”^⑦可见，麋鹿角成为战争武备的象征。一方面，麋鹿用鹿角触人，团团围成防阵抵御敌人；另一方面，此兽善跑，能很快报告吉凶，以求得保护。可见鹿角之特性是善守御，能抵御外来侵犯。这种特性正与楚人希望死者安居阴宅，不受阴间鬼魅侵害的心理相符合。巫师将鹿角的特性加以巧妙地利用，移植到镇墓兽的头上，仿佛使镇墓兽因此而具有了驱赶鬼魅、保护死者形魄的灵性。此外，鹿角能够驱蛇和辟毒。在后世的道教文献中，还能看到这种南楚大地信仰的痕迹。如晋代葛洪《抱朴子·登涉篇》谈到野外驱蛇时说“或烧牛羊鹿角薰身，或带王方平雄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厌之也。”麝为鹿的一种，俗称香獐，形似鹿而小。这里说用麝香涂在手脚上，也可以辟蛇。笔者认

为因为鹿角可以辟邪，加之“或烧牛羊鹿角薰身”可以辟蛇^⑤，所以很多楚墓出土鹿角。如襄阳山湾的春秋早期楚墓中，便有7座墓随葬鹿角^⑥。同样在当阳赵家湖的楚墓中，7座没有出土镇墓兽的一椁一棺墓，也随葬有鹿角^⑦。楚式镇墓兽选用真鹿角来镇墓辟邪，是因为鹿能够吃蛇，鹿蹄可以踏蛇，又有着锐利的角可以驱蛇，烧鹿角又可以辟蛇。

清楚表明楚式镇墓兽对蛇有辟除和驱逐功用的是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抓蛇镇墓兽，其造型前肢上举，两爪持蛇，作吞食状^⑧。还有一种直接操蛇、噬蛇状的镇墓兽造型，如湖南湘乡牛形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镇墓兽也作噬蛇状，双首，一首为蛇形，另一首镇墓兽头作噬蛇状，而蛇似乎已经被压得不能动弹^⑨。楚系曾侯乙墓墓主的内棺上，绘有753条各种龙蛇纹^⑩，占有动物纹饰的84.1%，威武的守卫武士和旁边执戈掌盾的方相氏，都反映出楚人对蛇的惧怕厌恶和驱赶打压。楚墓中的文物形制常见凤、虎、鹿对蛇的压制，长沙楚墓中出土了大鸟觅蛇形状的漆樽、双蛇座对凤鼓架^⑪；九连墩出土的最大的、形制最复杂的一个虎座凤架鼓，座下的两只虎狠狠地踩着四条蛇；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木雕座屏中，雕刻有凤、鹿、蛇等27个动物，其中有4只鹿，形体高大，角枝突出，作奔跑踏蛇状。这些造型，显然可以起到对蛇类邪祟的警示作用，对死者灵魂在墓葬中有可能遇到的危险作事先预防，意味着蛇之类的妖魔鬼怪，都已被镇墓兽俘获，也预示着死者在墓葬中再也不可能遇到他们的威胁。

（二）兽面——人面

《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雉，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圻。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据郑玄注所述“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这种对死后亡灵造成危害的方良，为木石之怪。在《庄子·达生篇》提到“野有方皇。”成玄英的《庄子疏》曰“方皇，状如蛇，两头，五采文。”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方皇与方良，音亦相似，疑为一神。”看来，方良的原型应该是蛇。很多出土棺木的漆棺画上都有驱蛇的形象，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上，就

绘有兽头人身的神怪，持蛇作吞食状，食蛇后作舞蹈状，形态非常生动^⑫。在上古的巫术中，人们常用厌胜的法术来降伏和驱赶恶魔，就是将恶魔的整体或部分躯体选出，放置在特定的位置，以表示战胜或者驯服了对方。所以一些驱蛇的神兽身上往往有蛇的特征，鼎盛时期的镇墓兽大都吐着长长的舌头，曲颈蛇身，躯干上还刻有鳞纹，原因就在于此。另外，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圻，驱魍象。’魍象好吃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古人此类迷信甚多，如绘虎于门，烧虎皮饮服，系虎爪于身进行驱赶邪鬼，等等。“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持搏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⑬古人常以物解物，借助某种物体的自然特性把它转移到毫不相干的另一种物体上，使另一种物体具有由自然物性转化而来的特殊功能。鼎盛时期的镇墓兽出现“凸眼，龇牙，长舌，曲颈”的蛇形，面目似兽的虎面，都是利用蛇、虎的形象来厌胜辟邪。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关注很多，在此不再赘述^⑭。

从战国中期的兽面变为战国晚期的人面，曲颈长舌的龙形也逐渐恢复简单，拟人化倾向十分明显。古代社会，人们有着浓烈的“万物有灵”、“动物崇拜”、“灵魂不死”的观念，现实中许多凶猛的动物都被赋予神性而加以崇拜，希望通过模仿而获得其强大的力量。结合原始巫术，巫师们往往用这些形象来以邪压邪、以同制同，驱魔辟邪以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尤其到了战国中期，楚国中分天下，“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⑮，其政治、经济、影响力达到巅峰。此时的镇墓兽面目威严肃穆，具有震慑气势。到了战国晚期，礼崩乐坏，天人相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逐渐增长，自信心不断增强，从而出现了理性和人性的特征。战国后期，楚式木制的镇墓兽消失。直到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3号汉墓斜坡墓道口两侧，放置着东西相对的两个人形镇墓俑，泥木质，头插鹿角，作跽坐状^⑯，与信阳长台关1号墓所出的极为相似，但换成了战国晚期的人面，显然是受到了镇墓兽的影响，被视作其继承形制^⑰。后世逐渐兴起的石制、铜制、陶制的镇墓兽，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兽

同体或人性化趋势。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出随着人类力量的增强,由早先依赖自然的原始思维,发展成更发达的文明意识,人性的自我尊崇意识开始占据首位,开始尝试用人或神的力量而不是神兽的力量来控制自然。这也是镇墓兽战国晚期向人面木俑方向发展的原因。

(三) 底座

在发现的所有镇墓兽中,除了河南信阳蹲坐着的2件外,其他均有底座。不论是早期祖型,还是晚期的人面,镇墓兽底座一直存在,而且变化最小,稳定性最强。早期为覆斗状方座,后来变为梯形,逐渐出现凸凹相间的九个方块。除了安放平稳外,底座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有学者认为是“九宫图”的引申义,假借九宫之神的威力来保护亡灵,象征着镇妖辟邪,保佑亡灵不受妖魔的侵害。还有学者认为镇墓兽自下而上的三个部分分别象征墓主人在冥府、人间及天界的三处居所。

中国古代一直相信天圆地方,方座往往代表着坚实的大地。《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礼神者,心象其类。璧圆象天,琮方象地。”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古人认为地是方的,作为祭祀大地的礼器,玉琮的外观为方形,中间有圆洞,意思为“贯通”,便于巫师与鬼神沟通。作为墓葬中的丧葬用器,底座应象征着地下幽都。凸凹相间的九个方块应该代表着八方和中央共九个方向,如同九州的概念一样。《楚辞·招魂》中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方位概念。地上世界有九个方位,地下幽都也同样如此。作为死后的地下世界,幽都在古人想象中充满着鬼怪,所以在周代就出现了专门驱鬼辟邪的巫官方相氏。镇墓兽主要放在头箱和边箱中,是与死者灵魂有关的重要位置。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学术界大多认为其作用是引魂升天。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人间、地下三个世界,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楚人同样信仰灵魂不死,又有着强烈的魂魄观念,在《楚辞·招魂》中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地下世界“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胸血拇,逐人駸駸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幽都

不仅有吃人的土伯,还有疫鬼方良,还有好吃亡者肝脑的魍象。所以楚人必须招死者之魂,使他们“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如果“魂魄离散,汝筮予之”,为了避免幽都鬼怪对墓主人死后的侵扰,巫师们要用“以邪驱邪”的巫术来保护死后的魂魄。镇墓兽的种种特征,是为了维护地下幽都世界的安宁。底座象征地下的幽都,其面目恐怖怪诞,身躯似蛇似虎,鹿角代表着守御和角斗,都是为了驱赶辟除地下的鬼怪和邪恶,守护魂魄,从而让死者得以入土为安,安居地下。

六、总结

本文从考古发掘资料出发,通过对时间差异、地区差异、等级差异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楚式镇墓兽形制变化的规律,并初步考察了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镇墓兽分为三个部分:鹿角、头身、底座。真的麋鹿角用来辟邪,虎面蛇身借用巫术的力量驱蛇辟鬼,梯形底座象征地下的幽都。

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1. 所插鹿角为麋鹿角。麋鹿与先秦祭祀和巫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鹿角有辟邪的功能。楚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凤、虎的形象;而鹿和蛇同样值得深究。2. 镇墓兽可以根据形制,附会传说中的某种神兽,但根据其早期的形制、晚期的变化以及严格的等级区别,应该是先秦楚国丧葬礼制中的常设物。《仪礼·士丧礼》曰“祝取铭,置于重……甸人置重于中庭。”贾公彦疏曰“今且置于重,必且置于者,重与主皆是录神之物故也。”镇墓兽很可能就是“主”或“重”。但是依据先秦礼制,这两样不该随葬墓中,而是放在生者庭堂上。而镇墓兽应该是用来依附地下世界死者的灵魂。3. 战国晚期后,镇墓兽逐渐消亡,不再出现,但根据其最后的形制和继承样式,应该转变为后来汉代的木俑,接着发展为陶俑。日本人松崎权子就楚墓中的俑和镇墓兽的随葬情况作了详细比较,发现战国中期以后镇墓兽逐渐减少,而木俑在楚墓中的随葬比例逐渐升高。在镇墓兽习俗消失后,木俑葬仍在楚国的故地流传,没有受到楚亡的影响,并且给汉代盛极一时的陶俑造型以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的陶制镇墓兽,仍然保有着持蛇吞食、怒目圆睁、头顶有角等形象,可以看出镇墓辟邪作用的继承和发展。不管具体是哪一种神怪,作为楚文化的典型

器物,镇墓兽不仅折射出楚国的自然社会环境和信仰,也反映出人类早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 ① 傅喻 《镇墓兽的历史流变》,《文史杂谈》1993年第1期。
- ②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镇墓神物》,文物出版社,2004年。
- ③ [日]水野清一:《关于长沙出土的木偶》,《东方学报》1937年第8期。
- ④ [日]梅原未治 《传长沙出土的木雕怪兽像》,《宝云》1938年第21册,收入《支那考古学论考》,弘文堂书房,1944年。
- ⑤ 商承祚 《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中华书局,1996年。
- ⑥ 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⑦ 王瑞明 《“镇墓兽”考》,《文物》1979年第6期。
- ⑧③④⑥ 陈跃均、院文清 《“镇墓兽”略考》,《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 ⑨ 彭浩 《“镇墓兽”新解》,《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 ⑩③ 吴荣曾 《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文物》1989年第10期。
- ⑪ 蒋卫东 《“镇墓兽”意义辨》,《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 ⑫⑤ 顾丞峰 《镇墓俑兽形制演变析》,《楚文艺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
- ⑬ 潘佳红 《小议“镇墓兽”——与〈“镇墓兽”意义辨〉一文商榷》,《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
- ⑭⑦ 张君 《论楚国神秘器物镇墓兽的文化涵义》,《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 ⑮ 邱东联 《“镇墓兽”辨考》,《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 ⑯ [日]松崎权子著、陈洪译 《关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木俑与镇墓兽》,《文博》1995年第1期。
- ⑰ 陈振裕 《略论镇墓兽的用途和名称》,《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13卷第5期。
- ⑱ 郑曙斌 《楚墓帛画、镇墓兽的魂魄观念》,《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 ⑲⑤④ [日]吉村苕子著、贾晓梅译 《楚墓镇墓兽的产生和展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7年第3期;贾晓梅译,吉村苕子 《楚墓镇墓兽的产生和展开》(续),《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7年第4期。
- ⑳ 王子今 《“镇墓兽”原始》,《寻根》1999年第6期。
- ㉑ 邹英都 《楚器“镇墓兽”形制内涵探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㉒ 王琳 《也说楚墓出土的鸟架鼓镇墓兽及其他》,《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年第1期。
- ㉓ 杨怡 《楚式镇墓兽的式微和汉俑的兴起——解析秦汉灵魂观的转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 ㉔ 袁朝、李儒胜 《“镇墓兽”源流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 ㉕ 丁兰 《试论楚式“镇墓兽”与东周时期楚民族的巫文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㉖ 高崇文 《楚“镇墓兽”为“祖重”解》,《文物》2008年第9期。
- ㉗ 安志敏、陈公柔 《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63年第9期。
- ㉘⑦ 孙作云 《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考古》1973年第4期。
- ㉙ 文崇一:《楚文化研究》,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
- ㉚ 张正明 《楚文化史》,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㉛ 张正明 《楚文化志》,9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㉜ 杨景鹤 《方相氏与大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一本,132~15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㉝ 李玉洁 《试论楚文化的墓葬特色》,《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 ㉞ 皮道坚 《楚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㉟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 《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 ㊱④ 湖北省博物馆 《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 ㊲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 ㊳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 《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 ㊴⑦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雨台山楚墓》,108~10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 ㊵⑧⑤⑥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九店东周墓》,303~535页,科学出版社,1995年。
- ㊶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望山沙冢楚墓》,9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 ㊷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18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下转第68页)

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歛然，诸夏皆仿效。”^②

《后汉书·梁统列传附玄孙冀》载，在妻子孙寿的影响下，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按李贤注，“埤，下也”；狭冠，“盖折其巾之上角也”；拥身扇系“大扇”；狐尾褙衣则是“后裾曳地，若狐尾”的褙衣。这些服饰与传统服饰有显著区别。

“林宗巾”：林宗是东汉后期大名士郭太的字，他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很大影响。一次，郭林宗外出时遇雨，雨水将其头巾淋成两角，时人见了，纷纷效仿，并把这种戴法称为“林宗巾”。

《后汉书·马廖传》：“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是帛’。”

《后汉书·明德马皇后记》引《东观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这种发髻也在皇宫外流行。

从以上记载看，“名人效应”对汉代服饰产生的影响，多是发生在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的中后期。结合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社会政治混乱，传统礼制受到严重践踏，社会因素对人们审美追求的禁锢减弱，人的个性得到充分释放，服饰的社会性减弱。“名人效应”在这种“无规矩”的社会背景下的影响尤为明显。追求自由、彰显个性成为包括服饰在内的艺术追求。个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在决定服饰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加大，使得东汉服饰以突出人的个性为主。

- ① 徐蕊 《汉代服饰二题》，《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徐蕊 《汉代女子服饰的类型分析》，《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徐蕊 《汉代服装色彩的考古学研究》，《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

- ② 《后汉书》志十三，3270页，中华书局，1965年。

（责任编辑：武 玮）

（上接第62页）

- ④⑤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墓》，3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④⑨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 ⑤⑩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图73，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⑤①⑦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湘乡牛形山1、2号大型战国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⑤②⑤③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信阳楚墓》，60~114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⑤⑦⑤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 《当阳赵家湖楚墓》，22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根据附表二、三：甲、乙类墓分期登记表的随葬品统计，出土镇墓兽10件，与第158页中的11件稍有出入）

- ⑤⑨ 湖北省鄂城县博物馆 《鄂城楚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 ⑥① （汉）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
- ⑥②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礼仪志中·冬至》。
- ⑥③ （东晋）葛洪 《抱朴子·卷十七·登涉篇》。
- ⑥⑧ 郭德维 《楚系墓葬研究》，26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⑥⑨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楚墓》，541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 ⑦① 《风俗通义·祀典》。
- ⑦③ 《战国策·中山策》。
- ⑦④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 ⑦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镇墓神物·序》，文物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向 祎）